

花 酒 啤 野



重 庆 出 版 社

野 啤 酒 花



[苏]尤里·阿弗杰延科著 斯仁译

野 啤 酒 花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5.75 插页2 字数310千
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100

ISBN 7-5366-0054-2

I·10

书号: 10114·334 定价: 2.95元



内 容 简 介

娜塔莎自幼失去父亲，中学还未毕业，母亲也去世了。娜塔莎小小年纪便踏上了社会。她的美貌很快就使她陷入了爱情的烦恼中。她结识的第一位男朋友是一个情场老手，娜塔莎摆脱了他。后来，一次偶然的机，她与厂刊编辑、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布罗夫相爱并结了婚。婚后，娜塔莎努力工作，考上了电大，入了党，担任工会主席……而布罗夫却只能在厂刊上发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自己还自以为是。渐渐地，娜塔莎发现，聪明的人并不见得一定会为她所爱。于是，他们之间的裂痕出现了……

小说主题鲜明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。主人公以自己的行动表明：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自立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尊的思想，执着地追求，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。

苏联中央工会理事会和苏联作家协会授予小说《野啤酒花》的作者尤里·阿弗杰延科以1974—1976年度全苏反映当代苏维埃工人阶级的优秀文学作品竞赛鼓励奖。



在我的生活中，发生的事情太多，太多！

——尤里·奥廖沙*

眷恋之情突然飞到了远方那薄雾缭绕、山菇簇生的树林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妈妈常带我去采摘那些山菇。此刻，恨不得能再回到那树林里去。那里，斑驳的阳光，活像小兔似的，在林间小道上窜来窜去，活蹦乱跳；那里，安宁静谧，就连蚊豕上也没有丝毫的骚动和不安；那里，蓝天习惯地俯在白桦树上，犹如拄着一根巨大的拐杖……

“娜塔什——”我听见了房东太太那“什一”的声音。她是卢戈娃娅的远房亲戚，好像是姨妈吧。我没作声，懒得去答理她。

父亲也喜欢树林吗？

可母亲从来没有谈起过此事。她并不经常回忆父亲。不过，一旦她回忆起来，我们这间小小的屋里顿时就会变得安静起来，明亮起来，仿佛整个房间都在凝神倾听母亲那普普通通，但却充满幸福和忧伤的话语，当然，如果忧伤可与幸

*尤里·卡尔洛维奇·奥廖沙（1899—1960）苏联俄罗斯族作家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羡慕》、剧本《善行的清单》等。

福作伴的话。

是的，父亲一定是喜欢树林的。要不然，这瓣野啤酒花从何而来？瞧，野啤酒花被整整齐齐地压干了，珍藏在揉皱了的战斗笔记中。花瓣旁边记载着战斗中失去的伙伴，侦察中抓获的俘虏……父亲在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摘下这片花瓣的？又为什么要把它夹在笔记中？谁能回答我的这些问题？

“娜塔莎！”老太太顺着小路走来。她穿的裙子长得连脚后跟都遮住了。“娜塔莎，这是给你的。哎，我还没弄清你姓什么呢……”

电报上不多不少写着二十个字：

“考试改在星期二，不是星期四。速电区委。卢戈娃娅。”

白桦树叶在微微颤抖。阳光渗过树叶，洒在电报纸上，明亮的小光斑如同一只只小白兔，在纸上与灰蓝色的阴影嬉戏着，晃来晃去。北边吹来的风，带着一阵阵泥土和青草的芬芳，以及发热但又未发烫的尘埃的气息。尽管晴空万里，湛蓝如洗，但果园中的一切仍是那样清新宜人，如同在秋日里一般。当然，秋天也常有炎热的时候，也有蜘蛛在树枝上吐丝织网，但地上散发出的不是尘埃的气息，而是凋萎的树叶味，微甜、辛香。

这就是说，考试从星期四提前到星期二了。Haben, habte, gehabt. * as Wmachen sie? ** 您这是在做什么，哦，

* 德语，为“是”的现在时、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。

** 德语：“意为：他们在干什么？”



是在远离莫斯科一百多公里的地方准备研究生的考试……

Ich bin, du bist……*

农舍就跟它的主人一样，老得驼了背。它座落在一个照料不周的菜园后面。菜园里，几只母鸡在畦间踱来踱去。紧靠菜园的草地上，有一群真资格的奶牛在吃草。

“是公家来的？”老太太问。

“什么公家的？”我没听懂。

“我说那电报，可能是……”

“是安娜·瓦西莉耶芙娜发来的。”

“我说是公家来的嘛，”老太太拖长声音说道，“安卡她从头到脚都是公家的人。”

“这个词儿听起来真不舒服。”我说。

老太太当然不同意我的说法。她耸了耸瘦骨嶙峋的肩头，津津有味地舔了一下毫无血泽的嘴唇，像是在品尝什么美味佳肴：

“词儿嘛，又不是黍米，啥样儿的都有。”

我又读了一遍电报。卢戈娃娅把它发出来还不到一个小时，但她肯定已经在等我的电话了。她跟我一样，是个急性子。

应该去给她挂电话。安娜·瓦西莉耶芙娜一定还想告诉我点儿什么。大概要说：积极行动起来，显示出你的性格……

她很会说诸如此类的话，而且还不是简单地一说了之。

* 德语，“我是，你是。”

她还要耐心地劝导你，点燃你的热情，鼓舞你的斗志。这一切，本来就是她的职业……

“我要去趟镇上。”

老太太好像发热病似的一个劲地摇晃着脑袋。她拖着沙哑的嗓子，几乎是唱着说道：

“买点面包回来。要白面包。你们这些莫斯科人啦，干吗只想吃黑面包。”她说完就笑了起来，笑得那么天真烂漫，活像个吃奶的孩子。

春天里汽车压下的两道车辙，如今早已干硬，像两条伤疤似的，突出地卧在平坦的土路上。路旁的矢车菊，睁大一双双明亮的眼睛，看着那伤疤，流露出温顺、忧伤的神情。而母菊花则吃惊地眨巴着白色的睫毛。

这里没有乡村应有的那种宁静，因为公路干线就打这里经过。在近一公里的地段里，来往行驶的车辆，尤其是柴油车，发出隆隆的轰鸣声，由远而近，由近而远，持续不断，令人难受。当然，这喧闹声还谈不上震耳欲聋，但足以使人心烦意乱，犹如夜深人静时从隔壁房间传来的鼾声。

一排雄伟的高压输电线铁塔，宽宽地叉着四条腿，跨过田野，穿过树林，一直延伸到天边。铁塔上吊着一串串的深褐色的绝缘瓷瓶，在蓝天映衬下，显得异常美丽。

《小孩当心！》的警告牌一过，就算进了小镇。小镇街道两边的房子全是白色板壁结构。一株株纤细的小树，还没长大成荫。它们的影子投在人行道上，宛如一个个黑色的惊叫号，但没有下面那一点，因为那一点就像黄鼠狼钻洞一样，



藏到树根里去了。商店和电信局的招牌跟城里一样，是用霓虹灯管做的。不同的是，里面十分冷清，几乎没有顾客。这种情形在城里是不会有的……

我走进自动电话间，投了十五戈比。线路立刻就接通了。卢戈娃娅的声音并没因距离太远而有所改变，仿佛她就站在我身后一样。

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过了星期二就知道了。”我低声说道，回答得有些含糊。我不可能作出别的回答。

“事后补救，可就晚了哟……”

“我尽力而为吧……”

“直来直去，这是你的大敌。”

“不，我的敌人是软弱。”

“你应该成为坚强的人。”

“而且既聪明，又勇敢，还怕寂寞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我似乎一下子加快了语速。

“你感到寂寞了。”卢戈娃娅猜到了。

“有一点。我常到渔民那儿去做客。他们的鱼网很长。长得像一只大爪子。”

“鱼网不可能像爪子。”

“像，非常像，安娜·瓦西莉耶芙娜。”

紧接着是停顿。

谈话中的停顿，往往出现在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了之后，或者恰恰相反，出现在要把什么重要事情告诉对方，

并正为此而鼓足勇气的时候。

自动电话上突然闪出一排字：到结束谈话时间还剩下三十秒钟。于是，我又投了十五戈比到电话里。

卢戈娃娅说：

“我到过你家。给花浇了水，邮箱里的信件也取了。里面还有一包印刷品，是寄给你的。”

这不，开始了。

“你的语气干吗这么阴沉？是包裹里装着烂水果吗？有匿名信吗？”很明显，我着急起来。

“从外面看，包裹里好像是一本书。”卢戈娃娅心平气和地说。

“但愿那不是地雷。”

“我也希望如此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几乎大声嚷起来。

“包裹是布罗夫寄来的。”

我沉默了许久。然后，又放了十五戈比在计价器里，决定最后再问一次：

“是他的书吗？”

“包裹没拆开。”卢戈娃娅说道，声音像做报告时那么严肃。

“那就请您拆开。马上拆开！”

“我把包裹留在你家里了。不过，那本书很可能是他的。两年多杳无音信，他怎敢寄什么别的东西给你呢？”

她不了解布罗夫。然而，我又了解他吗？



我叹了口气，说：

“大概是吧……”

“这是你的胜利。”

“胜利是各式各样的。”对一切，我知道得太清楚了。

卢戈娃娅干巴巴地说道：

“我没时间安慰你。明天我要在大会上发言。一切都由你自己去弄明白。”

“我一定试试。”我顺从地答道。

“另外，一定要死记单词。每天至少记二十个。”

“这太难了。”

“但可以办到。”

“要看是对谁。”

“我总不能替你去考试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就是说，你应该好好准备。”

“就是说，我应该……”

我走出电话亭，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。我转身对着商店的橱窗，看到自己的影子映在玻璃上，两边是一听听的罐头。玻璃上还映出了一段街道和汽车站旁的长椅。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前不久在侦探小说里读到的一句话：借助于橱窗，可以确定是否有人跟踪。

没人跟踪我。

两个星期来，生活是那么单调，那么乏味，甚至都变得有点陌生了。就像有人在玩一种不很激烈的游戏，而自己呢，

虽懂得游戏规则，却只能站在游戏场外袖手旁观……我认为，死记硬背德语单词绝不是我的使命。再这样过两个星期，我简直会变成野人。昨天夜里，我就梦见了一个“infinitiv。”*它长得瘦高瘦高的，不知为啥还剃了个平头……

在商店买了一个大面包后，我并没直接回村，而是朝树林走去。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不知道。可能是因为树林上空一片湛蓝，也可能是想闻闻林中的芳香。

那是一片白桦林。古老的白桦林。树叶絮絮低语，仿佛在向你倾述爱情……听到这窃窃私语，就如同听到从别人窗户外，从别人花园里传来的低声吟唱一样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确切地说，一百个正确地说，只有从别人火热的心房里传来的歌声，才会叫人如此心驰神往。但事情也可能不是这样。本来嘛，一个人不是一下子就能准确地理解一切的。但也许正是在这种不理解中，孕育着一个人的巨大成功。而生命之所以流逝，大概也正是为了最终能理解一切。

“善与恶不是一目了然的。这本是条人人皆知的真理。可我们却经常将它忘掉，偏要像端煮沸了牛奶的锅一样，匆匆忙忙地去下结论”。卢戈娃娅常常这样说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她总是面带笑容，而一条条皱纹也总像水面的涟漪一样，浮现在她的脸上。

我喜欢听安娜·瓦西莉耶芙娜的声音。那声音中有种能迷惑我的东西。妈妈常说，从前，无论是乡下，还是城里，到处都能遇到靠念咒包治百病的老太太。这些人好像被叫做

* 动词不定式。



巫婆。当然，这完全是瞎编乱造，就像人们所说的蒙骗术一样，不过……很可能是这样：那些老太太具有某种特异功能。比如说吧，暗示功能。因此她们能通过暗示，使病人鼓起勇气，呸地一声把病魔这个大敌拒之门外。

我从未听说过卢戈娃娅抱怨过身体不适，抱怨劳累疲倦，甚至也没听说过她抱怨什么人。当然，对傻瓜应另当别论。

“叫苦就像流感一样，要传染的。”卢戈娃娅确信不疑地说。“应该把那些爱叫苦的人隔离起来。还要让他们付治疗费，直到医好为止。”

听她说话就像在听判决。随时随地都能这样讲话，那得需要天赋，需要才能。你听：

“两年多杳无音信，他怎敢寄什么别的东西给你……没有时间安慰你……一切由你自己去弄明白。”

弄明白……弄明白……个人生活中的一切，都应分别搁在架子上，有条不紊。欢乐搁架，愚蠢搁架、痛苦搁架。左边放学习，右边摆工作。或者，应该反过来放，右边摆学习，左边放工作？谁知道呢？我不知道……不知道。我只能回忆一些事情，一些主要的事情。当然，它们也许根本不是主要的，而是些除我之外，谁也不感兴趣的琐碎小事，一些妇道人家的小事。往事的回忆，只有在耄耋之年，只有当你度过的岁月串联起来能延伸到天边的时候，才会显得美好。但，往事也许根本就无须回忆。也许，回忆除了勾连缕缕愁绪，已不能改变生活中的任何东西。真是这样的吗？显然，不是这样的。不是。再说一遍：不是……

第一章

1

我出生于一九四四年三月。更确切地说，是三月十三日。据说，十三这个数字是厄运与不幸的象征。但对我来说，它并不那么可怕。我总认为：一个人的生日应是幸福的日子，其他看法都是偏见。

在那个战乱的春天，我母亲在索尔—依列茨克车站当清洁工。我父亲，则在德军后方搞侦察。当然，这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他是侦察兵，可母亲当时并不知道。这类事情是不能在信中透露的。所以，父亲在信中没写这些，只说他在打法西斯。母亲很信任他，因为她知道，父亲是个勇敢的人。战前，父亲在心爱的斯巴达克足球队里当守门员时，曾多次奋不顾身地扑向进攻者脚下夺球。这些，母亲都亲眼看见过。

四五年四月，医生告诉母亲，怀疑我得了

肺结核。几乎是在同一天，母亲又收到了父亲的阵亡通知书。当时，我才一岁多一点。真的，仅仅多一点。

母亲毫不犹豫地扔下劳动工具：桶、拖帕、抹布，搭上顺路车就朝巴什基尔牧马人那儿奔去，去给女儿找治病的酸马奶。

从母亲给我讲的故事里，我想像着：草原是圆的，地平线也是圆的，就像条蓝色的发箍；马群在草原上时而疾驰，卷起团团尘埃，时而又慢步徜徉，发出疲惫的蹄声；一群群绵羊，白色的、黑色的，咩咩直叫。我还想像到了草原上的太阳。很多很多的太阳，比水，比面包还多得多。

马奶的味道我现在已记不得了。但它治病的功效显然是神奇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打那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说我的肺不好了。

一九四八年夏天，我们离开草原，回到了莫斯科。我记得，有个地方挤着很多人，撞来撞去，喧声震天。我猜，那可能是当时的喀山火车站。

父母在战前住的那间房子被别人占用了。我不知道，当时是否有法叫人家把它腾出来。反正，母亲当时没能办到。她当了卡朗切弗克街上的清扫工。房管局分给我们一间住房，又小又冷。为了住房，母亲换了几次工作地点。我快上学的那年，即一九五一年，我们住进了一间稍微像样的屋里；在罗斯托金大街上一幢工棚式简易楼房的二楼上。

母亲的去世很突然。死在厨房里。当时她已准备好了午饭，正坐在窗边的凳子上等我放学回家，是邻居格里沙跑到